

集美“一精神三文化”理论建构研究

王惠蓉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为集美“一精神三文化”进行理论建构有其必要性。集美“一精神三文化”是地方精神文脉与地方文化治理和思政教育相融合的重要思想宝库, 它以“嘉庚精神”为理论主题, 包含核心要义、概念系统、内容主体、基本外延、关系结构、实践方略等六位一体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集美“一精神三文化”; 嘉庚精神; 闽南文化; 华侨文化; 学村文化

[中图分类号] G 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5-0010-09

一、引言

集美“一精神三文化”的发源地在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地处闽南地区, 也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出生地。“一精神”指的是“嘉庚精神”, “三文化”指的是该地方特有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与学村文化。作为爱国华侨, 嘉庚先生自1913年创办集美小学开始, 先后在国内创办了包含集美师范、中学、航海、水产、农林等在内的集美学校和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大学厦门大学, “集美学村”也由此形成^[1]。嘉庚先生一生历经4个重要阶段, 即从“少年华侨到华侨领袖的艰苦创业之路”“从倾资兴学到改造华侨社会的奉献社会之路”“从加入同盟会到抗日、反美、反蒋的紧跟革命之路”, 直到“从回国参政到为国建设的奋斗终身之路”^[2]。这4个人生阶段将嘉庚先生经历史风云铸锻的办学思想及教育救国的爱国主义实践凝聚成重要的地方精神“嘉庚精神”, 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 是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2]。集美学村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融合了具有鲜明海洋文化特征的华侨文化, 并与闽南文化共同凝聚成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多元文化集合体, 被称为“学村文化”。因此, “嘉庚精神”及孕育其中又相

融生长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学村文化”(被称为“三文化”)共同构筑了地方文化精神的风骨与血脉。

2014年, 厦门市集美区委七届十四次全会提出实施“人文集美”发展战略, 明确人文集美的内涵为“一精神三文化”, 要求从更高层次、更广视野系统诠释和建构“一精神三文化”的理论内涵, 繁荣发展地方文化, 使之成为地方精神文脉融入新时代思想的重要智库。由此, 对它的研究意义重大。

所谓理论建构, 就是要把以自然形态或文本形态存在的概念、范畴、原理或主要内涵、内容主体等转化为以自觉形态或叙述形态存在的体系, 形成有特定结构的内在联系紧密、有机统一的整体。集美“一精神三文化”的理论内涵(以下简称“一精神三文化”理论)总体上是由其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嘉庚精神”及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学村文化共同构成的自然形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有关研究成果的文本形态共同构成, 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基础, 又有持续不断的学术发展史, 理应成为地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理论建构方法中, 存在一对“主题逻辑—内容逻辑”的理路, 即将理论打开为主题体系, 主题体系进一步打开为内容体系, 两者由此

[收稿日期] 2022-02-17

[基金项目] 厦门市集美区社科调研重大课题“集美‘一精神三文化’理论体系建构研究”(JMSK202002)

[作者简介] 王惠蓉(1975—), 女, 福建漳州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文化传播、文化产业研究。

形成对应的逻辑理路。它是对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打开和深化^[3]。这一理路中的内容建构，大多数都遵循要素完备原则，即尽可能地满足前提要素、实效要素、价值要素、核心要素、形式要素和实践要素等等^[4]，其中前提、实效、价值等要素是理论构成的必要条件，核心、形式和实践等要素则构成理论内容主体，当然前3个要素往往与后3个要素同构存在并互为文本。从“一精神三文化”固有的学术史脉络来看，它的理论内涵及其所对应的文化内涵和形式更符合“主题逻辑—内容逻辑”这一理路。它所具备的前3个要素在上文阐述的历史发展与当下意义中已呈现。而后3个要素，则是确定其核心与本质、内涵与外延、层次与秩序、应用与实践等理论内容的重要导引。由此，下文将依循这一建构方法，提出“一精神三文化”的理论架构，即包含核心要义、概念系统、内容主体、关系结构、基本外延、实践方略等六位一体的主要内容。

二、核心要义

理论的核心要义是指一个理论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观点、思想、理念与主题，是该理论的基础和灵魂，也是其独特性和创新性的来源。“一精神三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已表明，对其进行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基线是：由“嘉庚精神”这一主题逻辑生成了“三文化”的内容逻辑，而该内容逻辑必须倚赖主题逻辑而成，并解释和表现主题逻辑，也就是说“三文化”皆是围绕着“嘉庚精神”这个主题而生成丰富的特殊内容，否则“三文化”将各自回归成无边界的文

化形态，无法成为一个理论研究对象。当前诸多关于“嘉庚精神”的研究成果都蕴含着对“三文化”的历史属性、文化特性和时代意义的阐述。与此同时，有关对“三文化”的理解与阐述也都离不开“嘉庚精神”这一内核，这都充分证实“嘉庚精神”与“三文化”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内在同一性。这也由此使得“一精神三文化”作为一个理论研究对象有坚实的学理性依据，它的学术史脉络也集中体现在对“嘉庚精神”的研究路径上，并凸显出理论的核心要义即“嘉庚精神”，亦是其突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它的形成发展大致有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嘉庚精神”概念形成阶段，始于抗战时期。1940年，时任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在《致嘉庚先生莅汀欢迎词》中首次提到“先生之伟大精神”，并将嘉庚先生的个人事迹与爱国精神进行了直接且本质上的联结^[5]。第二个阶段是同在抗战时期，厦门大学何厉生先生著文概括出“嘉庚精神”的六大方面和重要内涵^①，即“牺牲精神”“信义精神”“勤俭精神”“求实精神”“奋斗精神”和“报国精神”等。文章虽然并未有更深入和完整的学理性建构，但由此带领“嘉庚精神”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21世纪前，是理论研究的跃升阶段。20世纪80年代，“嘉庚精神”研究泛起新的高潮。1983—1985年，厦门大学校刊及《集美校友》分别发表了对“嘉庚精神”含义的文章^②；到了90年代，关于“嘉庚精神”的学术立说逐渐丰富。1994—1999年，杨立冰、林德时、朱立文、张楚琨、雷克啸等在各自的文章或著述中皆提出较为完整的“嘉庚

① 该文发表在《厦大通讯》“欢迎嘉庚先生专号”上，文章标题就直接使用了“嘉庚精神”一词。

② 1983年10月20日，厦门大学校刊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力发扬“嘉庚精神”》，文章指出，“嘉庚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方面，而且体现在他爱乡爱国、倾资办学的伟大事业上”，在这里，“爱乡爱国”作为“嘉庚精神”的重要方面也被凸显出来。1985年，《集美校友》第26期刊文《学习“嘉庚精神”的感受——纪念陈嘉庚创办水产航海学校65周年》，作者何远帆说，“所谓‘嘉庚精神’的含义，应是集中在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他诚毅、大公无私、明辨是非、嫉恶如仇、不说假话、不畏强暴、言必信、行必果、与人相处肝胆相照的高风亮节，在兴学、经营工商业、政治态度、待人接物等场合，随时表现出来，感人肺腑”。

精神”内涵^①。一致性地提炼出“嘉庚精神”的核心内涵即“爱国主义”，同时也涵盖了闽南传统精神(如“勤慎俭约”“尚义行廉”“无私奉献”“不说假话”“嫉恶如仇”等)和华侨文化精神(如坚持正义、兴业报乡报国、支持国家大业等)。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以后，“嘉庚精神”的理论概念朝向高度精炼、简洁易懂及稳定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忠、公、诚、毅、勤俭、革新”等八字概念为代表。这8个字的概括，初步体现了“嘉庚精神”的3个层面，即个人层面的品德、社会层面的品质、国家层面的品格等^②。由“忠公”概念代表“爱国精神”位居首位并贯穿前后。肖仕平等学者认为，“嘉庚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它所蕴含的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导向和公民价值准则三个方面的具体诉求又恰好契合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内涵^[5]。从根本上说，“嘉庚精神”与“三文化”是朴素的为人品德、社会品格与传统的民族爱国精神之间的融合。

由此再回溯嘉庚先生早期政治品格生成的契机，便可使得这一理论主题更凸显其坚实的历史根基。嘉庚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亲赴延安寻找救国之人，他在随处可见的细微之处发现了延安精神：“延安正生长着一种新的精神，居住着一位人格高尚的共产党人，他实际、诚恳、简朴、自律、乐观、新颖，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常人所不及的经历与精神，有着处处从民族、从民众考

虑的宏才大略。”^③从这个历史时期起，“嘉庚精神”的生发与“延安精神”发生了内在衔接，从而脱胎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爱国精神，自觉地与国家民族大业的政治内涵相合，是具有更高家国情怀与眼界的政治家精神的体现。由此，“嘉庚精神”所蕴含的“爱国主义”在实践层面，也自然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爱国家的精神纲领具有了更为广阔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在元理论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获得初步统一。因此，“嘉庚精神”是有着新时代理论基础与实践根基的爱国精神，它的纯洁性、质朴性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所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的纯洁性和历史的必然性高度统一，这是它在新时代中能够永葆活力的坚实内核。

三、概念体系

概念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具体复杂的对象属性中，抽象出来的对事物本质的概括或描述。理论建构通常要有一套概念体系架构理论内涵和结构性特征，这个体系首先对理论核心有重要的支架功能。本研究即以简要的概念集合支架“一精神三文化”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层次。依循现有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将按个人、社会及国家等3个层面建立其概念体系。

个人层面的概念群为：崇天顺德、艰苦朴

① 1994年，杨立冰撰文《“嘉庚精神”及其特点》提出：“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目光远大、坚持真理，是贯彻‘嘉庚精神’的一条红线，也是‘嘉庚精神’的核心。”1995年，林德时对“嘉庚精神”的概括富有创新，他将概括出来的“嘉庚精神”归为几个方面，并细化出6个方面的本质特征，他说：“爱国主义为其本质特征，倾资办学为其主要表现，诚信果敢为其精髓所在，勤慎俭约为其主体传统本色，尚义行廉为其主体的完善人格，开拓进取的革新观为其跨国界跨时代的显著特征。”1997年，朱立文在《陈嘉庚精神和当代海外华人》一文中概括“嘉庚精神”：“坚持正义、重铸民魂；开拓视野、服务社会；兴才育学、造福人类。其核心体现了维护人类进步为先，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1998年，全国侨联顾问张楚琨概括“嘉庚精神”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弘扬诚毅、振兴中华，教育为本、科技兴国，统一大业、造福人群”。1999年，雷克啸编著《陈嘉庚精神》一书，将“嘉庚精神”的内涵归纳为爱国爱乡、嫉恶如仇、勇于进取、无私奉献和克己奉公等等。

② 个人层面的品德即勤俭、革新，这是陈嘉庚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文人行事的“道德毅力”与创业改革意识，这也具备了典型的闽南文化特征；社会层面的品质即诚信和毅力，“诚”代表实事求是、言必信行必果的社会契约精神，“毅”代表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以此养成优良的行为规范，这二者是嘉庚先生造就辉煌成果的精神信仰，也是濡养社会品德的重要精神食粮；国家层面的品格即忠诚、天下为公。“忠”代表了“嘉庚精神”的本质特征，指其爱国主义精神；“公”的含义有人仅仅阐述为“嘉庚精神”倾资办学和投入公共事业行动的具体表现，这一点从历史角度看，不尽其全然。新时代下，“嘉庚精神”的“忠”“公”精神展现应提升到国家层面来认识，“忠”面对的是国家，“公”面向的天下人民，代表着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实现的最高远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③ 该资料采录自厦门大学朱水涌教授于2021年11月在厦门大学读者分享会上的讲座。

素、自强不息。它们集中体现的是闽南文化中为人的道德修养、处世态度及价值取向。“崇天顺德”是闽南人从心而出的质朴的自然观、世界观，蕴含着自然和谐的理念；“艰苦朴素”是闽南人朴素的人生观，是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和行为规范；因由以上内容，濡养出闽南人“自强不息”的价值观，是人们处理自身发展与世界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因此闽南文化中生出了深厚的“孝”文化，它是“大爱”文化的具体表现，最终与“天道”“忠公”意识又获得紧密联结。闽南人秉承“孝感动天”的精神，坚信人只要赤胆忠心，就能成功，也表达了闽南文化对大道容德容法的合理解释，是《礼记》中所说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闽南文化的各种形态无不体现了这3个概念所展示的特质和内在精神品质。这3个概念不是用来形容个体特征，而是对如何深入且全面地理解“嘉庚精神”内核的理论性总结。没有这3个概念，“嘉庚精神”无从诞生。

社会层面的概念群为：尊师重教、诚毅无私、卓越奉献。这是个人层面的精神品质与社会层面发生紧密联结后所生成的社会品格，是“嘉庚精神”在宗族、社区及海外侨属地所获得的广泛深入的社会公德与集体价值观念的集合。当嘉庚先生投身“教育救国”宏伟事业后，“嘉庚精神”就开始了它的社会性发展。早期“嘉庚精神”回馈社会的思想体现出的是中国传统的“社稷”观。传统的“社稷”观是中国“商士”群体尊奉崇天顺德的朴素道德观，他们一般以回馈社会、造福一方社稷为理想。而“崇教”是回馈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仕”的培育基础，代表着培养为国家所用的精英群体的重要精神信仰。因此，“尊师重教”是“嘉庚精神”成为社会精神财富的基本属性，也是其“爱国主义”形成的重要奠基。在这个基础上，“嘉庚精神”将推行什么样的教育事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实践探索，融合了闽南文化所蕴含的个人精神品格，逐步形成社会性的文化品格，即诚毅无私、卓越奉献。“诚毅无私”是“嘉庚精神”对作为社会公民应具有的行为规范的引导与培育，是对中国传统文化

“忠”的注解，即对人对事真心诚意，无二心，这也是集美学村“诚毅”校训的文化源头，最终形成了“嘉庚精神”的“卓越奉献”的大格局。这种奉献精神突破了小家和家族范畴，不断迈向为民族为国家的更高层面。社会层面这3个概念的发展代表理论核心形成的过程，也是实践的总结，没有这一过程，该理论或将成为空中楼阁。

国家层面的概念群为：爱党爱国、忠公天下、改革创新。这3个概念是“嘉庚精神”发展成熟之后所形成的政治品格，它开始于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2个历史时期中的“嘉庚精神”实践。嘉庚先生当年所做的正确的政治选择将其个人和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选择彰显了嘉庚先生深明民族大义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是心怀天下的胸襟才具备的政治品格。它进一步明确了“嘉庚精神”的本质是爱党爱国一体化，由此也确立了闽南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忠公天下”精神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这2个概念自觉地形成了该理论的政治准则，从而也将“嘉庚精神”与“三文化”共融到国家民族认同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统一中。在这一规定性下，改革创新也必然是“一精神三文化”不可或缺的自然特性。

概而论之，崇天顺德、艰苦朴素、自强不息；尊师重教、诚毅无私、卓越奉献；爱党爱国、忠公天下、改革创新等九重定义体现出了概念之间的层级关系、过程关系及内涵的演进关系等，将“一精神三文化”的理论内涵作了整体性凝练，也在理论层面上完成了概念体系的构建。

四、内容主体

内容主体的制定通常是对应理论范畴和形式要素而言。理论范畴主要用来指定客观事物之间本质性联系的思维活动形式，是理论内涵的具体化表现，它能总体性地概括出理论核心所对应的研究对象、具体问题或相对应的基本思想或观点，或者基本形式。“一精神三文化”的理论主题所对应的特定内容主体由“闽南文化”“华侨

文化”“学村文化”组成,它们既是内容,也是理论构成的重要形式,因为是它们的客观存在和永续发展才构成形而上的“嘉庚精神”。

1. 闽南文化的知识性及世界性发展。闽南文化的知识性指的是在与“嘉庚精神”的特定关系下的闽南社会所形成的既有品德、信仰、行为及社会互动等各方面内容,这些内容已达成一种特殊稳固的公共性认知,是被广泛接纳的创造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信念或准则。

因受华夏地理文化及地处偏僻因素的影响,闽南人带有中原骨血的慷慨、冒险开拓的精神和天不怕地不怕、敢拼会赢的气概等文化特征。但在此之外,闽南文化还因民间信仰对人性的濡养形成了对天、地、神、自然的敬畏之心。这种精气神的多元结合,逐渐酝酿出闽南人的“忠”与“公”精神。闽南文化中朴素的“忠”精神代表了对天地的恭敬与顺服;朴素的“公”精神在“忠”的意识形态下表现出对“公有”“公共”“公益”以及“社稷”的奉献与回馈的精神。闽南文化中对“国家”的认知隐藏有造福与绵延华夏子孙的“神”体的意味,它所蕴含的“回馈”思想日久酿成以国家、社稷及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闽南文化中的“忠”“公”思想是“嘉庚精神”的重要本源。这也就能够回答嘉庚先生“一个海角小渔村的人,为什么能在异邦的土地上建立起中国人的商业王国?一个没有家学只有几年私塾背景的人,却能够将自己生命的全部奉献给中国与人类的教育事业,成为世人高山仰止的教育事业家?他的一生并没有受什么伟人 or 大师指点,却为什么总在历史转折点上,做出最为远见卓识的生命抉择?”^[6]之问,因为闽南人相信,至诚则灵,但凡一个人的内心澄净清澈,远大高尚,必有大成就、大丰碑。因此,只有在这样的闽南文化中,人们才能够深入精神层面去解读“嘉庚精神”和它所紧密联系着的“三文化”。嘉庚先生作为一位中国公民和作为一个华侨领袖的人生经历,都极致地发挥了闽南人“敢于创新、勇于开拓、抗争不屈、理性思考”的人格魅力,也蕴藏着“故土情深、国民天职”的奉献精神。也正是由于这

种“嘉庚精神”的实践与升华,推进了闽南文化从朴素的民间文化形态走向知识性的文化遗产,从而再由华侨文化的推动发展成为世界性文化。闽南文化的知识性建构了“一精神三文化”最基本的内容。

2. 华侨文化的开放性及“归去来”思想。“华侨文化”是展现“嘉庚精神”特质的重要内容与形式,与嘉庚先生的爱国思想具有一体本真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大约起源于晚清时期,华侨回乡办教育的目标多是因切身感受到在国外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人民所经受的痛苦和耻辱,由此盼望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由此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艰苦奋斗、团结卓越,精诚奉献家乡教育。嘉庚先生言:“祖国当局,无论走哪条路,亦需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因为这是救国保种之道”^①。华侨教育的特质不是为了适应海外侨地国家的教育背景,而是要保住华侨的民族性,传承祖国文化。因此,华侨文化的本质也是“爱国教育”。同时,华侨文化因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有着坚定的“开放性”特征,它既要保留民族种族之根本,紧守侨胞们内心的精神家园,又要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侨属地文化,还需放眼越洋看世界的变化与格局,以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在以上这2种文化张力的互动过程中酝酿而成华侨文化的“归去来”思想,是华侨对“回归家园”的“精神回归”的寄望,即人生的拼搏与奋斗是为了实现回归祖国报效国家的理想。“归去来”思想在华侨群体中的形成是构成“一精神三文化”理论特质的重要基因。

3. 学村文化的包容性及革新性象征。“学村文化”是有形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和无形的“嘉庚精神”共同建构起来的地方人文空间和理性精神。它充分体现了嘉庚先生“在文化环境中育人”的教育理念^[7],也呈现出多元教育兼容并蓄、紧跟时代改革创新象征意义。

集美学村在物质文明层面体现的是中外美学的融合与创新,“中”即是闽南文化代表的中国元素,“外”即是海洋文化与华侨文化的混合元素;在精神文明层面则是通过嘉庚先生爱国为民

① 采录自作者于2021年8月对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董立功老师的访谈资料。

的精神，形塑了该地不断崭新发展的社会形态和结构。当年，超越时代的嘉庚建筑群的规划设计熔铸了“闽南文化”“华侨文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极高的科学、文化、艺术、教育等内涵和价值，奠定了集美城市的人文品格^[8]。时至今日，嘉庚建筑群的风貌与厦门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无缝衔接，仍在通过静态的文化表达持续向当地居民及学子进行着现代性的人文思想教育及美育。现代学村在“一精神三文化”的濡养下仍然迸发出鲜明的革新特性，快速融入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大潮。可以说，“学村文化”所创造出的特定审美情绪是构成“一精神三文化”理论品格的重要形式。

五、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是对理论核心、内容、形式等各层次及形式确立特定的表达形式或秩序。理解了关系结构就能明确理论范畴，反之亦然。

从理论构成而言，“一精神三文化”有两大面向，存在一对主客体关系。“嘉庚精神”是“三文化”的主体，它统摄“三文化”的内涵质性及表现方式；“三文化”是对“嘉庚精神”的反映和发展，同时作为客体又反作用于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的主体性特质。

从内容与形式而言，“一精神三文化”的内容主体存在着特定的联系与包含关系。“闽南文化”是“三文化”的基础和来源，闽南文化的朴素形态通过侨胞在侨属地的传承与传播，与海洋文化不断发生碰撞和融合，从而生成以闽南文化为根系的海洋文化。只有这样多元融合的海洋文化回溯到闽南故土，在这里重新进行文化的追溯与发展，才有可能形成地方性的华侨文化。因而，集美“闽南文化”与“华侨文化”之间存有一个线性时间轴的介质文化——海洋文化。这种多元融合的螺旋上升发展的“闽、侨”文化最终落地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即集美学村。集美学村是“闽、侨”文化的合成与表达空间，从而形成一个“闽、海、侨、学”融合一体的新“大文化场景”。这四者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既有线性的历史逻辑，也存有螺旋上升的发展逻辑，没有“闽南文化”就形不成集美的

“华侨文化”，没有“嘉庚精神”和“华侨文化”，也构不成集美的“学村文化”；但是反过来，没有“学村文化”，也就不会有具体的“嘉庚精神”和“华侨文化”。

综上所述，“一精神三文化”的关系结构重点包含2个层级的理论范畴，即以“嘉庚精神”为理论核心的基础范畴和以“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学村文化”为内容的3个子层级范畴，这2个层级与其他要素共同构成多元辩证统一体（见图1）。本研究试对其关系结构给予以下规定：“一精神三文化”的理论前提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理论核心为“嘉庚精神”，“闽南文化”为第一层级理论范畴、“华侨文化”为第二层级理论范畴、“学村文化”为第三层级理论范畴，理论应用为“实践方略”。“一精神三文化”的理论表述为：“嘉庚精神”与“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学村文化”。

六、基本外延

集美“一精神三文化”理论既有多层次内涵，同时存有多元视角的基本外延。

1.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精神三文化”。这是该理论鲜明的政治文化特征，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时，都集中围绕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大主题。诸如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都应得到继承与发扬，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9]。“一精神三文化”则蕴含着以上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可称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作为弘扬中国家庭价值观的“一精神三文化”。闽南文化中的传统家风因闽籍华侨的海外开拓与文脉传承而获得世界性的传播，逐步形

成了以华侨文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家庭价值观,这是闽南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在时代潮流和国际形势的双重锻造下,嘉庚家风家训具有很强的现代特质:即吸纳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诗书传家’,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吸纳西方科学,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促成子女后辈立业成才”^[10]。因此,“一精神三文化”也是中国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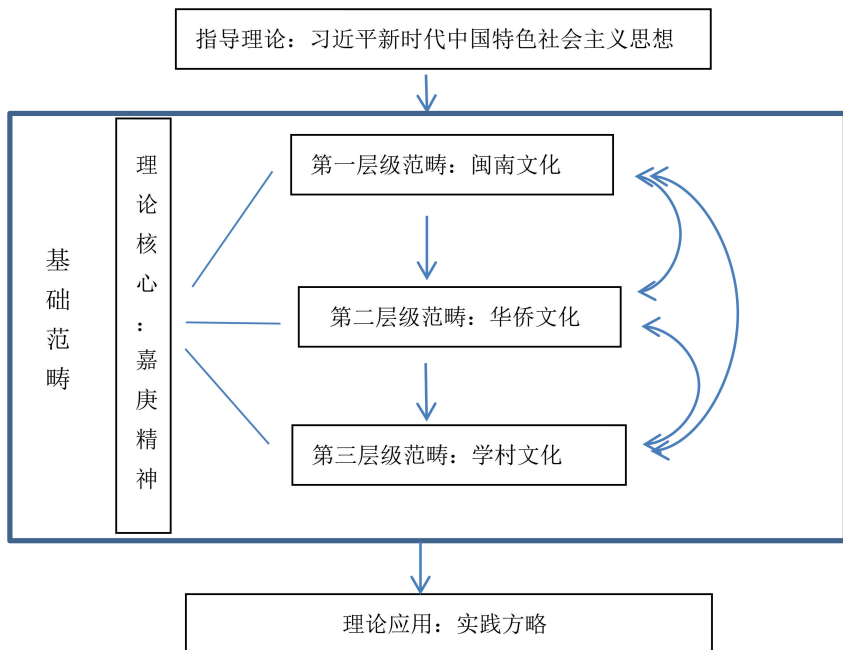


图 1 集美“一精神三文化”理论的关系结构

3. 作为创造地方文化资本的“一精神三文化”。集美学村是整体性的人文艺术文化遗产,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资本。留存在集美学村的历史建筑遗产、民间习俗、宗教信仰、乡规民约等闽南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集美学村的现代教育体系相得益彰,浑然一体,开创了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文化村落”^[11]。同时,集美学村也通过深植地方改革开放实践展示了嘉庚先生曾多次论述过的以“人民性”为特征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12],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哲学思想在历史的涤荡中酝酿成为珍贵的地方性文化遗产。

4. 作为建构华人华侨共同体意识的“一精神三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复兴使得一些东南亚华人被中国语言文化所吸引,他们开始“再中国化”(Resinification)^①。闽南文化中的语言功能及民俗文化在维系华人华侨的族群认同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当前海外华侨寻根之旅行动被众多海外侨胞当作一次“情感之旅”

“文化之旅”,它也成为海外侨胞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条途径。总体来说,集美“一精神三文化”对华人华侨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作用也是集美地方文化资本的重要内容。

七、理论应用的基本方略

集美“一精神三文化”是地方精神文脉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实践。它回答了新时代怎么建设和发展地方人文精神的问题,也是地方弘扬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

1.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基。任何理论从理论建构层面走向理论实践层面,都将经过一个集体意识的塑造过程,须完成更为深入的精神内化机制,才能最终形成坚实的认同态度。“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

① 采录自作者于 2021 年 8 月对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董立功教授的访谈资料。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这段阐述深刻地奠定了弘扬发展集美“一精神三文化”理论的重要思想根基。

2. 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创新是“嘉庚精神”的自有基因，集美“一精神三文化”的理论创新需与国家当前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一致。它的实践应与当前的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主旨联系在一起，通过持续的改革创新实现新时代下的“文化治理”功能，才能继续担起新的历史使命。

3. 坚持国际化发展策略。当前新发展格局下，国家对中国价值观的凝塑与传递，已经超越简单的国别与种族界面，进入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层面。面向海外侨胞建构“国族利益”的认同需通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发，充分展示“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理念，从而获得国际上一致性的话语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美“一精神三文化”须发挥先天的理论优势，坚持和拓展国际化发展策略，打开理论视野，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者，并提供更深入的理论支持。

4. 坚持家、国、社稷一体化的政治文化传播图略。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政治文化的传播是建立公正清明的政治社会的重要途径，它与营造积极正确的公共舆论和培育良好完善的政治感情的文化治理机制紧密相关。“一精神三文化”的理论发展是践行这一文化治理的重要精神财富，它在处理好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价值观与世界价值观、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几对关系时，充分展现了家、国、社稷一体化的认知关系：在“家”层面实现的是“教”化；在“国”层面实现的是“政”理，即能够将礼治中的内容施成治理法度，形成有效政策；在“社

稷”层面实现的是“治”功，即通过优秀传统文化达成有效的文化治理功效，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地方文脉。因此，集美“一精神三文化”理论应持续推行政治文化传播图略，将其文化之本转化为社稷治理之功。

八、结 语

“一精神三文化”具备理论价值、文化价值与功能价值等3个层面价值。理论价值是从国家视角建立地方性理论，是地方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实践；文化价值是从现代文明视角继承和发展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并得以实现其文化治理的开创性道路，对文化创新与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展开拓新的理论视角；功能价值主要从新发展格局视角满足地方社会的和谐发展需求，为同根同源的海内外同胞、侨胞建立历史根脉完全、思想境界和谐、精神品格高尚的家国一体化的大文化时空，同时，对提升地方的文化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只有持久深入地加强“一精神三文化”理论研究，才能使得深厚的地方性精神文脉转化为地方的重要思想宝库。

[参考文献]

- [1] 张培春，刘晓斌. 陈嘉庚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 [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6-11.
- [2] 王平. 《陈嘉庚之路》读后 [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3）：94-96.
- [3] 韩致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和理论要素论纲 [J]. 行政论坛，2018（6）：26-30.
- [4] 王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建构特色 [J]. 武警学院学报，2021（9）：47-51.
- [5] 肖仕平. “嘉庚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 [J].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2）：35-44.
- [6] 朱水涌. 陈嘉庚传 [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
- [7] 郭大光，梁振坤. 百年大学的“楼名文化”：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嘉庚建筑”楼名考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28-36.

- [8] 郑高菽. 集美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31.
- [9] 张军成, 侯天霞. 理论整合与思想整合: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儒家文化的契合点 [J]. 特区经济, 2014 (12): 213-215.
- [10] 余娜. 嘉庚家风家训 [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9: 1-5.
- [11] 李红钦.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J]. 理论园地, 2015 (30): 236-238.
- [12] 林德时. 试论陈嘉庚精神的内涵 [J]. 福建体育学院学报, 1995 (Z1): 70-77.
- [13] 王曦. 闽南方言跨境传播与族群认同 [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0 (5): 17-21.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18.

A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Jimei's "One Spirit and Three Cultures" Theory

WANG Huirong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t is essential to theoretically construct Jimei's "One Spirit and Three Cultures". It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reservoir of ideas that integrates local spiritual heritage with local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Jimei's "One Spirit and Three Cultures" centers around Jiageng Spirit as its theoretical theme, encompassing six interrelated components: core essence, conceptual system, main content body, basic extensions, relational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Key words: Jimei's "One Spirit and Three Cultures"; Jiageng Spirit; Minnan culture; culture of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village culture

(责任编辑 张永汀)

(上接第 9 页)

Responsibility: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CPC

ZHANG Maodong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it i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o respect the laws of history and conform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imes to anchor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grasp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the responsibility to strengthen the will to fight and face risks and challenges; to adhere to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urage of self-revolution. These constitute the main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CPC. In terms of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the feeling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eople are to seek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the feeling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untry are to seek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for the country, the feelings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re to seek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feeling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ld are to seek harmony for the world. These are the inner emotional supports that nurture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CPC. In specific practice, having the courag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winning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being good at taking responsibility and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being willing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all these are effective ways to implement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Key words: responsibility; historical initiative; cognitive dimension; emotional support; practical path

(责任编辑 冯庆福)